2026年11月5日 星期四 责编:赵润琴 美编:段博伟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

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君子之道 道德修养的崇高目标

王爱军

“君子”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。何谓“君子”？朱熹的解释是:“君子,成德之名。”君子是对道德成就者的称谓,即品德修养臻于完善、真正成就了德行的人。君子的标准有很多,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忠、信、勇等。北宋张载将士人君子的追求概括为四句话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应该说,君子是一个人道德追求的崇高目标,是品性修养的至高境界。

以仁为本 与人为善

仁是君子的核心品质。孟子说: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,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,以礼存心。”意思是说,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原因,就在于他内心的所思所想。君子心里装着仁,心里守着礼,他们以仁德待人,体恤、关爱、尊重他人,乐于助人。

晏婴是齐国的国相。有一天,齐景公因晏婴的住宅靠近集市又狭小嘈杂,想给他换个地方,修建一处大宅院。晏婴拒绝了,说住宅虽然小点儿,但邻近市场,采买物品方便。景公笑着说:“那你说说市场上哪些东西贵？哪些东西贱?”晏婴回答说:“踊贵,屦贱。”踊是古代受刖刑者所用的特制假肢,一说为特制鞋。晏婴借此暗示刑罚繁滥:受刖刑的人太多,踊因而供不应求,价格昂贵。齐景公听了内心十分不安,于是下令减省苛刑。

又有一次,齐国连续下了三天大雪,齐景公穿着一件白色狐皮大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,对晏婴感叹说:“奇怪啊,都下了三天大雪了,天怎么不冷呢?”晏婴回答说:“我听说古代的贤德君主,自己吃饱却知道别人的饥饿,自己穿暖却知道别人的寒冷,自己安逸却知道别人的劳苦,现在您却不知道这些。”景公惭愧地说:“说得好!我听明白了你的教诲。”于是下令给那些饥饿受冻的百姓发放粮食和衣物,又派人在全国查访生活困苦的百姓,由官府予以救济。

晏婴不仅劝谏国君善待百姓,自己也身体力行、扶危济困。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上》记载,齐国人北郭骚家境贫寒,没有固定的产业,只能依靠结渔网、编织蒲苇、缝制草鞋的微薄收入奉养年迈的母亲,终日辛劳,生活依旧难以为继,实在走投无路,便登门向晏子求助。晏子听闻他的处境,十分同情,当即派人分出官仓中的粮食与府库中的金钱接济他。北郭骚为人清介自持,不愿无端收受钱财,于是谢绝了金钱馈赠,只收下维持母子生计的粮食。晏子懂得急人之难,体恤贫寒之士,待人仁厚真诚,并非只向君主空讲爱民的道理,而是亲身践行仁善。这份体恤底层民众的本心,与他规劝君主体恤百姓、宽待万民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,充分体现出君子以仁存心、表里如一的修养。

晏婴为人为政,始终心怀他人、心系百姓,处处为百姓着想,将旁人的疾苦放在心上,展现出了以仁为本的君子品格。难怪司马迁满怀敬意地写道:“假令晏子而在,余虽为之执鞭,所忻慕焉!”如果晏子还活着,即使替他执鞭赶车,我也心甘情愿,并对此欣喜仰慕。

在孔子看来,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内涵。在任何境况下,作为君子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,否则便称不上君子。所以,《论语》有言:“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”强调君子一刻也不能违背仁德,哪怕是在仓促紧迫的关头或是颠沛流离的困境之中,都不能放弃仁德这个根本。即使面临生死抉择,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”,有志向、有仁德的人,不会为了保全性命而损害仁德,必要时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。仁德的核心要义就是仁爱之心,即孔子所说的“仁者爱人”。这份对他人的慈爱与善良,是成就君子人格最基本的要素。

义以为质 坦荡无私

孔子常常将君子与小人相比较,区分二者的根本标准便是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即对君子而言,道义始终高于个人私利。所以,君子把“义”作为自身行动的根本准则,而不像小人那样优先追逐私利。

北宋时,章惇当了宰相后,对元祐旧臣大加贬谪,有着“布衣宰相”之称的范纯仁被贬往湖南永州。彼时范纯仁已经七十岁,又罹患眼疾,双目近乎失明。儿子们陪同他南下,一路历尽艰辛,便将满腔怨气归咎于章惇,痛斥章惇陷害忠良。范纯仁听闻,便批评儿子们:“孔子曾说过,‘不怨天,不尤人’,不要遭遇困苦就怨责这个、埋怨那个。”有一次渡江,范纯仁所乘的船只忽然倾覆,所幸距离岸边不远,儿子们将他从水中搀扶上岸,他浑身都被江水浸透。登岸之后,他仍不忘教诲儿子们:“难道船翻,也是章惇造成的吗?”

到永州不久,儿子范正思一日兴冲冲跑来告知:“我们可以返回朝廷了。”范纯仁心生疑惑。范正思解释说:“韩维不是也被贬到均州了吗,最近他的儿子跟章惇申辩,说他父亲执政期间与司马光多有不合,韩维因此得以解除贬谪。当年您也曾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新法,既然已有这样的先例,我们也可以借此为由申诉。”范纯仁摇头说:“我因司马光的举荐而官至宰相。昔日同朝议事,观点存有分歧本属常事,岂能拿往日的政见,作为今日脱罪的借口？那样我会内心愧疚。与其心怀愧疚苟活,不如问心无愧而死。”范纯仁在永州居住三年,元符三年(1100)宋徽宗即位,范纯仁获赦北归,次年离世。他不是没有改变境遇的机会,却始终不愿效仿韩维之子的做法,更不肯攻讦司马光来为自己开脱罪责。

范纯仁不肯为了摆脱贬谪困境而仿效他人、指摘同僚,根源在于他心中恪守不可动摇的道德准则,那便是道义。“君子义以为上”,君子在价值取舍上,将道义视作至高的行为规范。《论语》有言: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”意思是说,君子对待天下人与事,没有必须如此的偏执,也没有绝对不可如此的成见,一切行事都要依从道义。秉持这样的道义标尺,君子面对物欲诱惑便不会迷失本心。正如孔子所言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”追求物质利益必须合乎道义,依靠不合道义的手段得来的利益,君子决不接受。

在确立“义”作为根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,儒家又提出了一些君子的行为准则,如“君子义以为质,礼以行之,孙以出之,信以成之。君子哉”,即君子以道义作为立身根本,用礼仪规范践行道义,以谦逊的言辞表达道义,依靠诚信成就道义,这才是真正的君子。又如“君子不重则不威,学则不固。主忠信,无友不如己者,过,则勿惮改”,强调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,学问也难以扎实;做人要以忠信为本,不要结交在忠信德行上不如自己的人;自身有了过错,不要惧怕改正。坚守道义,君子方能襟怀坦荡、公正无私,拥有“君子坦荡荡”“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”的人格风范。

秉毅守志 笃行致远

子路向孔子请教何为君子,孔子给了三个递进式的答案——“修己以敬”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成为君子,首先要提升自我道德修养,但这只是起点,并非最终目的,更重要的是心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,做到立己达人、兼济苍生。

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年少便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。嘉祐三年(1058),他呈上长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系统地阐述了改革主张,震动朝野。熙宁二年(1069)二月,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开始变法。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由于触动了官僚、豪强和部分士大夫的既得利益,招致保守派的攻讦和指责,司马光也写信以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”四点指责新法。

面对诘难,王安石毫不退缩,写下了著名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,一一给予反驳:“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,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,以授之于有司,不为侵官;举先王之政,以兴利除弊,不为生事;为天下理财,不为征利;辟邪说,难壬人,不为拒谏。”我接受君主的诏令,在朝廷研讨、修订法令制度,再交付主管官吏执行,算不上侵夺官吏职权;推行前代圣王的治国方略,兴办善政、革除弊害,算不上滋生事端;为国家整顿财政,算不上搜刮财利;批驳错误言论,斥责奸佞小人,算不上拒绝劝谏。他进一步表明立场:“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,未能助上大有为,以膏泽斯民,则某知罪矣;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,守前所为而已,则非某之所敢知。”如果您责备我任职已久,没能辅佐君主大有作为,让百姓蒙受恩泽,那我甘愿领受罪责;如果说当下应当什么都不做,只固守旧法,这我便不敢认同。针对变法引来“天下怨谤”的非议,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人习于苟且非一日,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。上乃欲变此,而某不量敌之众寡,欲出力助上以抗之,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?”世人习惯于苟且因循已经很久,不少士大夫把不顾国家大局、附和世俗、讨好众人当作好事。君主想要革除这种积弊,我不顾反对者多少,竭力辅佐君主抵制流俗,众人又怎能不大吵大闹?

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以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概括王安石的变法精神,彰显他不惧灾异天象、不拘泥旧有法度、不忌惮世俗非议的气魄。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,但作为变法的倡导者与主持者,他身上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的无畏气概与责任担当,历来为后人称道。

《论语》有言: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。”意思是说,不必通过细碎小事来评判君子的才干,君子可以承担重大使命。《论语》亦云: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——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,可以把一国的政令交付给他,面临关乎大义的紧要关头,志向绝不被外力动摇。这样的人,是君子吗？正是君子。以上论述都在强调,君子当志存高远,勇于担当。

曾参讲得更为透彻,他说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君子要把弘扬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,尽管实现它任重道远,但却不可以轻易放弃,要秉毅守志,死而后已。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传承,才使一代又一代君子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。

谦恭知礼 卑以自牧

君子应当具备怎样的气度风范?《周易》的描绘是:“谦谦君子,卑以自牧也。”真正的君子,应当言行谦和、虚怀若谷,待人接物令人如沐春风。

唐代娄师德是个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,他功勋卓著、官高爵显,却始终谦恭礼让,毫无骄矜之态。有一次,娄师德与另一位宰相李昭德一同上朝,因为年迈加之身体肥胖,行走有些迟缓。李昭德脾气火暴,嫌他走得慢,很不耐烦,怒骂道:“田舍夫!”娄师德听了不仅不生气,还笑着说:“师德不为田舍夫,谁当为之!”

娄师德担任兵部尚书时,巡视并州,在一处驿站用餐。他发现自己碗中是白米饭,随行人员吃的却是糙米饭。娄师德心生疑惑,传唤驿长询问缘由。驿长诚惶诚恐地回答说:“不知道您今天来,一时找不到足够的细粮,真是死罪。”娄师德平和地说道:“是我们来得太仓促,导致你们来不及准备。这是我们的问题,不能怪罪于你。”然后命人把自己碗中的白米饭也换成糙米饭,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。

娄师德与狄仁杰同为宰相,狄仁杰内心轻视行事谨厚的娄师德,打算把他排挤出京城。有一天,武则天问狄仁杰:“娄师德贤明吗?”狄仁杰回答说:“他作为将领能谨慎守职,至于是否贤明,我就不清楚了。”武则天又问:“娄师德善于识人吗?”狄仁杰答道:“我曾与他同朝为官,没听说他有这方面的才能。”武则天说:“我之所以任命你为宰相,正是娄师德所举荐的。”说完拿出娄师德当初举荐狄仁杰的奏章。狄仁杰看完,十分惭愧,感慨道:“娄公盛德,我为所容乃不知,吾不逮远矣!”意思是说,娄公德行深厚,我长期被他包容却浑然不觉,我的德行远远比不上他。《朝野佥载》的作者张鹭称赞娄师德“可谓淑人君子,近代之名公者焉”,可以称得上是品德高尚的君子,也是当时难得的名臣。

娄师德进士及第,之后投笔从戎,征战沙场,屡建战功,威名远播。他的谦恭忍让,绝非性格软弱,而是后天修养使然。《论语》有言:“君子敬而无失,与人恭而有礼。”意思是说,君子处事严肃谨慎,少有过失;待人恭敬,恪守礼义。在儒家思想中,谦恭知礼是君子必备的素养,待人接物应当泰而不骄、礼让不争,表现出谦逊恭敬的态度,而不是恃才傲物,自以为是,让人敬而远之。

君子的谦和不是虚假的客套,而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。如荀子所说:“君子贤而能容罢,知而能容愚,博而能容浅,粹而能容杂,夫是之谓兼术。”真正的君子,自身贤能,却能够包容才干平庸之人;自身聪慧,却能够包容见识愚钝之人;自身学识渊博,却能够包容见识浅陋之人;自身品行纯粹,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,这便是兼容并蓄的处世之道。由此可见,君子的谦恭低调,是高尚的修养,更是高超的人生智慧。



吴讷题诗却馈金

刘立祥

廉史清风

吴讷(1372—1457),字敏德,号思庵,江苏常熟人。历任监察御史、浙江巡按御史、贵州巡按御史、南京右佥都御史、南京左副都御史等职。吴讷自幼立志向学,刻苦攻读,博览群书,有《小学集解》《文章辨体》《思庵诗集》等著作传世。吴讷为官刚直不阿,清风峻节,政绩卓然。明代名臣魏骥盛赞吴讷:“公为人端重纯明,履方居约,不以穷达易所守。”《明史·吴讷列传》评价他:“敬慎廉直,不务矫饰。”

明宣宗宣德年间,吴讷奉旨巡按贵州。他不负朝廷重托,铁面无私,秉公执法,全面清理当地陈年旧案,为百姓伸冤理枉,使得当地吏治与社会风气焕然一新。据《明史·吴讷列传》记载,吴讷巡按贵州,“恩威并行,蛮人畏服。将代还,部民诣阙乞留。不许。”大意是说,吴讷恪尽职守,恩威并施,赢得了当地吏民的敬服与爱戴,朝廷调吴讷还朝,委派他人接替其职务,当地百姓对吴讷依依不舍,自发地上书朝廷,请求朝廷收回成命,让吴讷继续留任,可惜朝廷没有允准。

据明代学者王锜的《寓圃杂记》记载,吴讷巡按贵州任满返朝,临别之时,贵州三司以黄金百两相赠,吴讷严词拒绝,随即启程回京复命。行至夔州府(今重庆奉节),忽见后方有船只疾驰追赶而来,吴讷心中颇为诧异。来人自称奉贵州三司官员差遣,专程前来向吴讷“略表心意”,一路日夜兼程,苦苦追赶,方才在夔州府追上吴讷。

来人恭恭敬敬地将一只精美的礼盒呈递给吴讷,称内有黄金百两,请吴讷务必笑纳。吴讷再三推辞,来人依旧执意恳请他收下。于是,吴讷略作思索,提笔直接在礼盒封条上题诗:“萧萧行李向东还,要过前途最险滩。若有赃私并土物,任他沉在碧波间。”

题诗完毕,吴讷将礼盒原封退还来人,转身登舟离去。来人见吴讷面对重金,心志坚定、态度决绝,不由得肃然起敬,向着吴讷的背影深鞠一躬,匆匆回贵州复命。

明英宗正统初年,光禄丞董正等人盗取官物,被吴讷揭发查办,此案案情盘根错节,牵涉甚广,涉案人员众多。有人劝他不必过于较真,以免树敌招怨,招致不必要的祸患。吴讷神色凛然,答复道:“我辈食朝廷俸禄,受圣上托付,岂可徇私枉法!”于是据实奏报朝廷,顺藤摸瓜,将涉案人员尽数查办,秉公审讯裁决,四十四人被依法判处发配戍边。消息传出,朝野为之震动。

吴讷的宦海生涯多数时间任职于监察领域,无论是身在朝堂,还是巡察地方,都刚正不阿,执法如山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在各个岗位均履职尽责,政绩突出。明英宗正统四年(1439),吴讷告老还乡,平日里布衣蔬食,居所简陋,每日读书著述,安贫乐道。时任应天巡抚周忱见吴讷生活清苦,提出为他翻新一下住所,被吴讷断然回绝。明英宗天顺元年(1457),吴讷病逝,享年八十六岁,谥号“文恪”。

何谓“三令五申”?

许晖

语词精奥

“三令五申”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再三地命令与告诫。为什么叫“三令五申”？何谓“三令”？何谓“五申”？这个成语的含义很丰富,可不是字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。

“三令五申”一词出自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
著名军事家孙武刚到吴国的时候,吴王阖闾请他用宫中的美女演习兵法。孙武将一百八十名美女分成两队,队长分别由吴王最宠爱的两位宠姬担任,各持一支长戟。

开始操练之前,孙武先“三令五申之”,然后击鼓命令她们向右转,众美女纷纷大笑。孙武说:“约束不明,申令不熟,将之罪也。”纪律不够严明,号令交代得不够清楚,这是将领的罪过。这一次,孙武把责任揽到了自己头上。

然后又一次“三令五申而鼓之左”,击鼓命令她们向左转,众美女又是笑成一片。这一次孙武不再客气,说:“约束不明,申令不熟,将之罪也;既已明而不如法者,吏士之罪也。”既然已经解释清楚,却仍不按照法令去做,那就是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罪过了。于是下令将两位队长斩首示众。

吴王远远望见,大惊,急忙劝阻。孙武回答说:“臣既已受命为将,将在军中,君命有所不受。”当即斩杀两位宠姬,重新任命了队长。

再次操练的时候,众美女再也不敢儿戏,战战兢兢,规规矩矩。吴王阖闾遂拜孙武为将,吴国得以崛起。

由此可知,“三令五申”原是军令,具体内容在北宋《武经总要》中有详细的说明。《武经总要》是曾公亮和丁度两位大臣奉宋仁宗之命,耗时五年编纂而成的,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。

“三令”和“五申”载于该书“教条十六事”,属于临阵时的军令:“一令:观敌人之谋,视道路之便,知生死之地;二令:听金鼓,视旌旗,以齐其耳目;三令:举斧钺,以宣其刑赏。”

第一条号令是战略与侦察:洞察敌人的阴谋企图,观察道路便利与否,判明何处是能生还的生境,何处是导致灭亡的死地;第二条号令是指挥与协同:听从金鼓的信号,看清旌旗的指向,以此来统一全军上下的听觉与视觉,做到步调一致;第三条号令是纪律与军法:树立起斧钺,以此来严明和宣示军队的惩罚与赏赐。这便是所谓的“三令”。

“一申:申赏罚,以一其心;二申:视分合,以一其途;三申:昼战戒旌旗;四申:夜战听火鼓;五申:听令不恭,视之以斧钺。”

第一次申诫:反复申明赏赐与惩罚的规矩,以此来统一全军的意志与决心;第二次申诫:反复申明各部队的分散与汇合调度,以此来统一全军的行动路线与作战方向;第三次申诫:白天作战时,要密切关注旌旗的指挥信号;第四次申诫:夜间作战时,要仔细辨识火把和军鼓发出的信号;第五次申诫:如果听从号令不够恭顺,执行不力,就用斧钺对其施以惩处。这便是所谓的“五申”。

可见,“三令”和“五申”都是士兵要牢记的军令,如果记不熟,上了战场不仅会影响本方军队的战阵,还会招致杀身之祸,因此需要“三令五申”,反复命令和告诫士兵们牢记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词义的演化,“三令五申”早已不再专指军事军令,而是泛用于上级对下级的反复命令和告诫,“三令”和“五申”原本的具体内容,也渐渐不为世人所知晓了。